



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
主 编 刘进宝

CULTURES ON THE SILK ROAD

丝路文明研究二题

试论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

朱雷

汉代的通关致书与肩水金关

王启涛

河西魏晋唐墓中的胡人形象

郭伟涛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五胡”时代公文书试探

郭水利

[日] 关尾史郎著 王雷 冯培红译

林梅村

南京象山 7 号墓出土西方舶来品考

粟特人的东方迁徙与唐王朝的成立

[日] 石见清裕著 齐会君译

李锦桥

汉唐西北边疆地区农业开发和畜牧业发展综述

邓盼

新见中古鱼氏的几方新材料

陈玮

安史之乱后唐北庭归朝官孙果墓志研究

杨富学 盖佳泽

陈菊霞

敦煌写卷“落蕃诗”创作年代再探

刘屹

悬泉镇与榆林窟

芮传明

印度 “Kauśāmbī 法灭故事” 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刘迎胜

摩尼教饮食规制考辨

马娟

摩合罗考

丝绸之路视阈下移民群体的身份与认同

宋翔

岑仲勉先生与西北史地研究

那波利贞先生的敦煌文书研究

[日] 芦沙雅章著 赵梦涵译 [日] 高田时雄校

斯坦因 1914 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研究

王冀青

评王子今《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

孙兆华

丝绸之路佛教语文学研究的开创之作

徐文塔

敦煌与西部的学术情结

冯培红

书评：《黄金半岛：1500 年以前马来半岛的历史地理》

鲁西奇

向达先生《中外交通小史》的当代价值

戴玲玲

第二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文明. 第二辑 / 刘进宝主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325-8691-2

I. ①丝… II. ①刘… III. ①丝绸之路—文集 IV.
①K928.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11431 号

丝路文明(第二辑)

刘进宝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75 插页 4 字数 369,000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691-2

K · 2417 定价：8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丝路文明》编辑缘起

晚清以来，西方探险家、考察家在我国西北和中亚地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探察活动，不仅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而且还在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许多古代的文物和文化遗存，将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古代与现代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关于“丝绸之路”，可能会有多种定义，也会有多种解说，但“丝绸之路”的主要功能是中外文明的交流与互鉴，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丝绸之路”的研究再次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浙江大学在原有学科优势的基础上，成立了“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团结校内外中坚力量，从事“丝绸之路”相关问题的研究。

《丝路文明》是以丝绸之路为主线，以阐释古代多元历史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推进当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为宗旨，刊发世界古代文明发展、交流、融合等研究成果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丝路文明》的创刊，旨在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交流平台，从长时段探讨中外文明交流，将“丝绸之路”的研究置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以刊登相关历史文化研究、丝绸之路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和考察新发现，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角度对丝路沿线出土文献与文物的解读，以及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学术史、学术性书评等文章为主。热诚欢迎国内外从事和关心“丝绸之路”研究的专家、学者、朋友们提出宝贵意见。

目 录

丝路文明研究二题	朱雷(1)
试论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	
——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	王启涛(5)
汉代的通关致书与肩水金关	郭伟涛(21)
河西魏晋唐墓中的胡人形象	郭永利(45)
《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五胡”时代公文书试探	
..... (日) 关尾史郎 著 王蕾 冯培红 译(61)	
南京象山 7 号墓出土西方舶来品考	
——兼论公元 5 世纪中国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的丝绸之路	林梅村(75)
粟特人的东方迁徙与唐王朝的成立	(日) 石见清裕 著 齐会君 译(91)
汉唐西北边疆地区农业开发和畜牧业发展综述	李锦绣(103)
新见中古鱼氏的几方新材料	
——兼论鱼氏族群的起源	邓盼(115)
安史之乱后唐北庭归朝官孙果墓志研究	陈玮(131)
敦煌写卷“落蕃诗”创作年代再探	杨富学 盖佳择(147)
悬泉镇与榆林窟	陈菊霞(173)
印度“Kauśāmbī 法灭故事”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刘屹(189)
摩尼教饮食规制考辨	芮传明(205)
摩合罗考	刘迎胜(221)
丝绸之路视阈下移民群体的身份与认同	
——以 9—14 世纪东南沿海地区穆斯林为中心的考察	马娟(231)
岑仲勉先生与西北史地研究	
宋翔(243)	
那波利贞先生的敦煌文书研究	
..... (日) 竹沙雅章 著 赵梦涵 译 (日) 高田时雄 校(253)	
斯坦因 1914 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研究	王冀青(261)

丝路文明(第二辑)

评王子今《汉简河西社会史料研究》	孙兆华(287)
丝绸之路佛教语文学研究的开创之作	
——辛岛静志《佛典语言及传承》简评	徐文堪(291)
敦煌与西部的学术情结	
——齐陈骏《敦煌学与古代西部文化》介评	冯培红(299)
书评:《黄金半岛:1500年以前马来半岛的历史地理》	鲁西奇(309)
向达先生《中外交通小史》的当代价值	殷盼盼(319)
跋敦煌所出汉《社日》简	赵大旺(4)
宋氏死期小考	许超雄(60)
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评介	李含慧(90)
《丝路译丛》及《驶向撒马尔罕的金色旅程》	闫丽(102)
丝路文明建设的重要一环:地方文献整理	吕瑞锋(242)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评介:以《菩萨蛮记》为中心	陈丽娟(260)

Contents

Two Case Studies on the Silk Road Civilization	Zhu Lei (1)
A Study of Language Situation and Policies along the Silk Road during the Jin-Tang Period: Focusing on Turfan Documents	Wang Qitao (5)
Official Passage Documents of the Han Dynasty and the Jianshuijinguan Pass	Guo Weitao (21)
The Images of the Sogdians in the Hexi tombs during the Jin-Tang Times	Guo Yongli (45)
Official Writings during the “Five-Barbarians” Times Collected in the <i>Xinhuo Tulufan Chutu Wenxian</i>	Sekio Shiro, translated by Wang Lei and Feng Peihong (61)
On the Western Exotics Unearthed in Tomb No.7 of Xiangshan Cemetery in Nanjing	Lin Meicun (75)
The Immigrations of the Sogdians to the East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Ishimi Kiyohiro, translated by Qi Huijun (91)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Han-Tang Northwestern Borderlands	Li Jinxiu (103)
On 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Yu Family: A Discussion on this Ethnic Group’s Rise	Deng Pan (115)
A Study of the Epitaph of Sun Gao who Came back to the Capital from the Beiting Area after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Chen Wei (131)
A New Study on the Date of the Luofan Poem in the Dunhuang Document	Yang Fuxue, Ge Jiaze (147)
The Xuanquan Fortress and the Yulin Grottoes	Chen Juxia (173)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the Indian Story of Kauśāmbī	Liu Yi (189)
A Study on the Diet Regulations of Manichaeism	Rui Chuanming (205)
On Moheluo	Liu Yingsheng (221)
The Identity of the Immigration Group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lk Road: Focusing on the Muslims of the South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9 – 14 Centuries	Ma Juan (231)

- Cen Zhongmian and His Studies of the Northwestern History and Geography Song Xiang (243)
- Naba Toshisada's Studies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s
- [Chikusa Masaasa], translated by Zhao Menghan, proofread by Takada Shio (253)
- A. Stein's Archaeological Diary on the Dunhuang Grottos in 1914 Wang Jiqing (261)
- Book review of *Hexi Shehui shi Ziliaoj Yanjiu* by Wang Zijin Sun Zhaohua (287)
- A Creative Study of Buddhist Languages on the Silk Road: A Brief Review of
Fodian Yuyan ji Chuancheng by Karashima Seishi Xu Wenkan (291)
- Dunhuang and the Academic Complex related to the West: A Review of
Dunhuangxue yu Gudai Xibu Wenhua by Qi Chenjun Feng Peihong (299)
- Huangjin Bandao: 1500 Nian yiqian Malaibandao de Lishi Dili* by Paul Wheatley Lu Xiqi (309)
- The Value of *Zhongwai Jiaotong Xiaoshi* by Xiang Da Yin Panpan (319)

丝路文明研究二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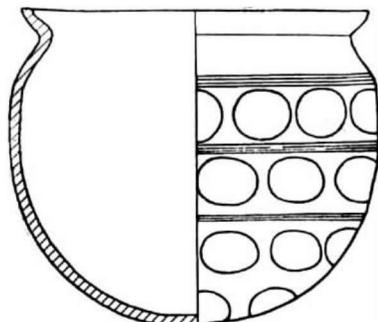
朱 雷

摘要：湖北鄂州西晋古墓出土的萨珊王朝钠钙玻璃，学者们认为是由海路传来。实际上早在永嘉之乱前，就已存在陆上与南方的交通，而在西晋时除了海路外，更多的应该是陆路。这些珍贵的“贡物”，也会为商人所关注，因此鄂城所出玻璃器，虽不排除海路的可能，但陆路经丝绸之路输入也是有证据的，即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引晋潘尼《琉璃椀赋》。杜环在大食国所见“汉匠”，学术界认为是怛逻斯之役中，被大食俘去“没落”者中的手艺者。当然大军之中有“手艺人”，如打铁、修造军器、攻城器械之专门者，但不可能带上金银匠、画匠、绫绢机杼工匠，这些皆非军事行动的需要。征召士兵，也一般不会征召工艺巧匠。这些工艺巧匠应该可能是粟特商人“勾引”而去的。

一、湖北鄂州西晋古墓出土萨珊王朝钠钙玻璃的由来

近阅《鄂城六朝墓》一书，见记一西晋古墓编号为M4021者，发现有若干玻璃制器碎片。其中十一片经拼合，复原成“完整器”。（见右图）

同书介绍，该玻璃器“侈口，折沿，球形腹，圆底，色泽较淡，略泛黄绿色，透明度好……口径10.2厘米，最大腹径11.0厘米”。整理后编号为M4021：3，定名为玻璃碗。编号为M402：4为一磨花玻璃碗的上腹部残片，色泽呈淡黄绿色。^①



^① 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州市博物馆编《鄂城六朝墓》，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303—305页。

据安家瑶先生的研究,这是波斯萨珊王朝的磨花玻璃碗。^①至于通过何种途径传入中国?判为孙吴时由海路传入,^②根据该书记载还有玻璃珠子等物出土,这些是否皆由海路而来?当时还有陆上丝路之路。

当然这也作为贡物,由使者献给西晋皇帝。但即因价值高,也必作为贵重商品,如同黄金制品、贵重药材一样,输入西晋王朝。王仲殊先生认为是孙吴时由海路传入。^③

这种推论自有其依据,但是我们知道还存在陆路的丝道,余昔年尝撰《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④一文,并引用斯坦因所获在敦煌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信函的翻译件,指出早在永嘉之乱前,就已存在丝路交通,就在大乱的五胡十六国时还在艰难地通行着,而在西晋时除了海路,更多恐怕是陆路吧。

就在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卷七三《杂器物部·盨》引晋潘尼《琉璃椀赋》曰:“览方贡之彼珍,玮兹椀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其所托也幽深。”^⑤同书卷八四《宝玉部下·琉璃》条亦引晋潘尼《琉璃椀赋》。^⑥两处引文,其文或有出入,语义全同,皆指出是由西而来。“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表明中国虽地大物博,但当时尚未学会制作玻璃制品,犹需通过陆道丝路传入,成为潘尼赋中“览方贡之彼珍”。^⑦

作为一方之珍物,除作为“贡物”,也为商人所关注,自然令经丝路贩运来以售于民间富人。因此鄂城所出玻璃器,在不排除海路的可能,陆路经丝绸之路输入也是有证据的。

二、谈杜环在大食国所见“汉匠”由来

《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引杜环《经行记》,记杜环因怛逻斯之败,被大食人俘去,“没落”十余年,经历十二国,记所见所闻。至大食国,见:

^① 安家瑶《北周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萨珊玻璃器的发现与研究》,载《考古》1986年第2期;《中国的早期玻璃器皿》,载《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② 《鄂城六朝墓》,第337页。

^③ 王仲殊《试论鄂城五里墩西晋墓出土波斯萨珊朝玻璃碗为吴时由海路传入》,载《考古》1995年第1期。

^④ 朱雷《东晋十六国时期姑臧、长安、襄阳的互市》,载黄惠贤、李文澜主编《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武汉出版社,1988年,第197—208页;后收入朱雷《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7—336页。

^⑤ (宋)欧阳询等编《艺文类聚》卷七三《杂器物部·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62页。

^⑥ 《艺文类聚》卷八四《宝玉部下·琉璃》,第1441—1442页。

^⑦ 潘尼,《晋书》有传,大文人潘岳之侄,于永嘉之乱中卒。(中华书局,1974年,第1507—1516页)

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隈、吕礼。^①

上引节文断局标点当有可商量之处，盖杜君卿之《通典》本节引杜环之《经行记》或有不当之处，后人标点断句时，或因误读、误断，吾意当作：

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隈、吕礼。

此盖言不少工匠皆“汉匠”充当，其后所言“画者”为京兆两人，并署名。织络者河东人，并署名。

关于杜环所见人的来由，今见中外人多言本因高仙芝于怛逻斯之役，被大食俘去“没落”者中之有专门的手艺者，这涉及军队的组成。当然大军之中有“手艺人”，如打铁、修造军器、攻城器械之专门者，但不可能带上金银匠、画匠、绫绢机杼工匠，这些皆非军事行动的需要。作为士兵的征召，也一般不会征召工艺巧匠（至于安史之乱起，发现有工商业者投军并未在军中服役，以避其他赋役，又作别论。）

考虑到粟特商人来华貿販久矣，首先知晓中国之特产，何地产何物，也知何地有何色能工巧匠。

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依此而谓是时唐人西游“去者接踵，流沙竟或康庄”。当然道路艰险，气候恶劣，沿途道匪充斥，从僧人游记中可见，流沙毕竟不是康庄大道，若不掌握路线图，具备长途行旅经验和关系的粟特商人“勾引”，这种具有特种工艺的高级人才被“引进”大食是不可能的。

联想到制镜技术由威尼斯如何传入法国，也即是“勾引”技工去法国，制造以牟利。与粟特商人“勾引”唐有特色技术工匠高手如出一辙。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① （唐）杜环著，张一纯笺注《经行记笺注》，中华书局，1963年，第55页。

跋敦煌所出汉《社日》简

赵大旺

1979年9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对马圈湾烽燧遗址（编号D21）进行科学发掘，发现了1221枚简牍，其中编号为五号探方所出的217、218二简，是关于汉代“社日”的记载，笔者称其为《社日》简。该简涉及汉代社日的活动内容，为其他材料所未见，因此向学界介绍该简，并考释部分字词。

《社日》简的图版和释文最先于1991年公布（《敦煌汉简》图版贰贰、释文第227页），笔者参照前人对该简的释录成果，对《社日》简的内容录文于下：

社日，众人尽坐，为卿明读爰书。约京（束）令卿，卿尽知之：卖社下贱平所市一餚以上，及发养所作治饮食，若塗堦社，皆不庄事，事罚平一石谷，赏以社。

社日，即举行社祭的日子，是民间的重大节日。汉代的里普遍立社，穷乡僻壤乃至边远地区都有里社。

爰书，自曹魏以来，学者们就对其有不同的理解（高敏《释“爰书”——读秦、汉简牍札记》，《益阳师专学报（哲科版）》1987年第2期），但都不出诉讼案件的范畴。《社日》简后接219—223号简牍恰好是一组记录法律案例的爰书，223号简仅书三字：“右爰书。”因此，《社日》简所说“爰书”应就是219—223号简上的法律案例。社日活动宣读法律文件，传世史籍也有迹可寻，《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有：“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亦如之。”唐贾公彦疏曰：“凡读法，皆因即会以聚民。今既祭，因聚民而读法。”至于读法的目的，也如同书同卷所说：“以考其德行道艺而劝之，以纠其过恶而戒之。”可见，汉代的乡里教化，除了儒家的乡党礼仪、孝悌力田等外，法律知识的普及也是重要内容。

发养，即负责做饭。《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二年有：“廸役扈养死者数百人”，注曰：“炊烹者曰养。”《新简》E.P.T40: 3也有分配做饭者的记载：“己卯卒十一人，其一人作卒养”，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金布律七五》规定：“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养各一人，其佐、史与其共养。”这里的“养”也是指负责做饭的人。社日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里中居民的聚宴，因此需要有负责做饭的人，该简中“发养所作治饮食”即是对负责做饭者的规定。

若塗堦社，“若”意同“及”，《史记·大宛列传》：“及汉使乌孙，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属”，《集解》对“若”解释说：“徐广曰：‘《汉书》作及，若意义亦及也。’”又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六〇简有：“廷行事有罪当迁，已断已令，未行而死若亡，其所包当诣迁所”，这里的“若”也应理解为“及”。“塗”，又写作“涂”，如《合校》214·5简：“堠楼不垂涂堦”，为涂抹之意。《释名·释首饰第十五》有：“胡粉，胡鬪也，脂和以塗面也。”敦煌汉简D21: 815号有：“二人塗西门外垣下足。”《说文·土部》：“堦，白涂也。”《释名·释宫室第十七》有：“堦，亚也，次也，先泥之，次以白灰饰之。”《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列置邮亭，皆塗堦之”。注曰：“堦，饰也，音火既反。郭璞曰：堦，白土也，音恶。”据汉简所见，“塗”与“堦”为两项不同的活动，如《新简》E.P.T40: 3简：“三人堦，五人塗，一人治传中”，则“塗”是先以泥涂之，而“堦”则是以“白土”装饰使其鲜明，如《合校》104·24有：“蓬火□□上盖堦，不鲜明”，《新简》E.P.T20: 4A也有：“谨修治社稷，令鲜明。”以上记载都表明在社日祭祀社神之前，社人要对社坛进行一番装饰。

试论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语言状况与语言政策 ——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

王启涛

摘要：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语言多彩之路。活跃在这条丝路上的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密切交往中相互学习和掌握对方的语言文字，不少人是双语人或多语人；晋唐中央王朝和高昌等丝路绿洲国家的各级政府和民间有为数不少的翻译队伍，这支队伍以粟特人居多；唐王朝为来自异邦异族的各界人士提供法律诉讼的语言服务，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从事诉讼翻译的人士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晋唐王朝在西域奉行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互利，在对于基层行政组织和行政职务的命名上，官方往往采用本地民族的语言形式，通过音译得以完成，而对于中高层行政组织和行政职务的命名，则来自汉语和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一言以蔽之：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语言习得之路、语言翻译之路、语言平等之路、语言互利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语言多彩之路。据不完全统计，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古代丝绸之路西域段曾经使用过20多种语言文字，其中语言主要有汉语、犍陀罗语、梵语、焉耆—龟兹语、于阗塞语、粟特语、古代突厥语、回鹘语、希伯来语、波斯语、叙利亚语、古藏语、西夏语、阿拉伯语、察合台语、蒙古语、满语等，文字主要有汉文、梵文、佉卢文、希伯来文、焉耆—龟兹文（旧称吐火罗文）、于阗文、古代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摩尼文、叙利亚文、婆罗米文、西夏文、契丹文、察合台文、古藏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文、满文等。^①那么，晋唐中央政府以及高昌国等西域绿洲国家在古代丝绸之路曾经推行了怎样的语言政策呢？随着近一百年来吐鲁番、和田、库车等地出土文献公之于众，我们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① 张铁山《新疆历史钱币上语言文字的交融与合璧》，《吐鲁番学研究》2015年第1期，第65—75页。

我们发现,古代丝绸之路原来是一条语言习得之路、语言翻译之路、语言平等之路、语言互利之路。请详而论之。

一、语言习得之路

语言学界把母语习得之后学习其他语言的行为称为“语言习得 (language acquisition)”,把能说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人叫做双语人 (bilingualism) 或多语人 (multilingualism)。^① 在古代丝绸之路,无论是汉民族还是各兄弟民族,在长期的密切交往过程中,往往都在自己的母语之外掌握了一种或多种其他民族的语言,成为双语人或多语人。古代吐鲁番是典型的多语地区。《周书》卷五〇《异域传下》载高昌:“服饰,丈夫从胡法,妇人略同华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子弟,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赋税则计田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② 高昌国是汉人建立的西域绿洲国家,官方语言和文字肯定是汉语和汉字,但是依然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胡语)和文字(胡书)。又检 Or.8210/斯 6251 Ast.ii.1.016–019《北凉玄始九年(420)随葬衣物疏》(沙 2–320):^③“左青龙右白虎前□□□物数,胡僧[受](?)□□”,可见北凉时期的“胡僧”就已经充当“书物数”的职责,也就是用汉字起草随葬衣物疏了。

正如语言学家所言:“只有五种语言在传布文化上有过压倒势力,它们是古典汉语、梵语、阿拉伯语、希腊语和拉丁语。”^④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各兄弟民族学习和掌握汉语蔚然成风,一些与唐西州军民处于敌对状态的外族军队也能说汉语。宁乐二〇(3)、七(2)号《唐西州都督府牒为巡罗覩探贼踪事一》(81):^⑤“都督府。镇副杨逸。右从幢[蓉]□□西至夸谷,逐要督察巡逻。束碛镇戍并□□□诸路,先配人马覩探,仰谷口高

①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62—163 页。

② 《周书》,中华书局,2009 年,第 915 页。黄文弼认为此处的“胡语”即突厥语,参看黄文弼《西域史地考古论集》,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197—198 页。韩森认为可能是龟兹语或粟特语,参看〔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年,第 107 页。

③ “沙 2–320”表示该件文书图版见于沙知、吴芳思《斯坦因第三次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第 2 册,第 320 页。

④ 〔美〕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陆志韦校订《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174 页。

⑤ “(81)”表明图版见于陈国灿、刘永增编《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文物出版社,1997 年,第 81 页,下同。本件文书被裁成二片,上下之间有缺字,2—3 行有“西州都督府之印”,是一件官文书。

山着人[去]□□。此等探巡，并当贼路，贼在达匪、悬泉□□，探者据高，谷下人马百方牢固，两头计□，□[觉]贼徒。贼内有汉语之人，弥须警策，□□督察，见骑贼即点绯幡，见步贼即□□幡。马于谷底馁，着人看守，与高山望□□□，记号的见。贼从东来，向东点幡。从□□，□西点，从北来，向北点。壹人点壹下，两人[来]□两下，若拾人已上、百人已下，急多点。谷[底]□□人见山头幡，的知贼来，即走马逐便[告]□，□都知界内兵马，烽火通明，处月劫[掠]□□□恒日交横，觇探勿招深累。——叁拾里内烽，依前县府官巡逻，朝。”这是西州都督府对蒲昌府进行全面布防的指令。“贼内有汉语之人”，意味着敌人中有懂汉语之人。

“桂林葡萄新吐蔓，武城刺蜜未可餐。军中置酒夜挝鼓，锦筵红烛月未午。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蕃王能汉语”。（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诗）^①这首富有史学价值的诗歌道出了当时西域兄弟民族学习和使用汉语的盛况。活跃于丝绸之路的各兄弟民族，有一些虽然在高昌和唐西州相对独立地聚族而居，^②使用着他们原有的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但是，他们又不得不面对汉语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强势地位，这些迁入者自然而然学习和使用汉语及汉字，成为地道的双语人或多语人，这就是今天的吐鲁番为什么既有那么丰富的汉文文献出土，又有那么多的胡语文献与世人见面。特别是那些经商的粟特人、从事劳作的突厥人，更是语言和文字方面的多面手。各兄弟民族中有不少人精通汉语，他们对汉语的语言认同（linguistic identity）背后更多是文化的认同。

在广袤的西域，考古学家们从墓葬中出土了都有不少双语文物，1975年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在哈拉和卓90号墓出土了18枚桃人木牌，正面书写汉文“代人”，其中17枚属于十六国高昌郡时期，一枚属于麹氏高昌时期，其中有不少反面写有粟特文字母拼写的汉语或突厥语，译为汉文也是“人”“代人”“人、仆人或妻子”之义，^③这座墓没有出土

^① 柴剑虹认为“桂林”即“洿林”之误（见柴剑虹著《桂林武城考》，载《武汉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关于“花门”，在《新唐书·地理志》中载居延海“又北里有花门山堡”，其地本唐置，天宝时为回纥所据。在杜甫诗《留花门》中指回纥，此指西州各少数民族。“叶河”见《新唐书·地理志》：“又渡叶叶河七十里有叶河守捉。”叶河守捉属北庭节度使领辖，在今乌苏市境内（参考冯承钧《西域地名》）。又参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1—212页。

^② 如“胡城”即胡人所居之城，可能指迁到西州的突厥人所住的地方。64TAM35：38(a)《武周某馆驿给乘长行马驴及粟草帐》(3-531)：“使人骨利幹乘往胡城[回]，壹日料，粟捌胜同达；草肆束。”（“3-531”指本件文书图版见于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叁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31页。）关于“胡城”，参考刘安志《唐代西州的突厥人》，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7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

^③ 见库尔班·外力《吐鲁番出土公元五世纪的古突厥语木牌》，载《文物》1981年第1期，第63—64页。

墓志,但是有《高昌阿苟母随葬衣物疏》。“苟”即“狗”,可能与祆教有关。“阿苟”或许是这批有关客使、账目文书的主人,他作为高昌的入籍粟特人,由于有语言和经商的本能,在高昌宾馆中接待远来的客使,最后把废弃的有关客使的文书制成丧葬的材料,埋入其母亲的墓中。^①

由于高昌与突厥和铁勒关系密切,从公元 554 年开始,突厥逐渐控制高昌,高昌通过突厥与西方各国联络,高昌国内衣着、发式都有突厥化的倾向。虽然官方语言是汉语,但是突厥语在这里肯定也是大行其道的。同时,高昌还与何国、焉耆、伊吾、铁勒等有来往。^② 我们可以从 69TKM33: 1/2(a)《高昌众保等传供粮食帐(一)》(1—238)、60TAM 307: 5/4《高昌竺佛图等传供食帐(三)》(1—414)、60TAM329: 23/1, 23/2《高昌虎牙元治等传供食帐(一)》(1—461)、73TAM517: 04/5《高昌元礼等传供粮食帐》(1—266)、75TKM90: 20(b)《高昌主簿张馆等传供帐》(1—123)中纷繁复杂的异族人名汉译中,看出当时高昌国有关突厥、铁勒、焉耆的汉译译名系统。^③

由于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和战争因素,一些汉人也学会了其他民族的语言。^④ 《旧

①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三联书店,2001 年,第 186—187 页。又参看孟凡人《吐鲁番出土的木俑和泥俑》,载赵华编《吐鲁番古墓葬出土艺术品》,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霍兰德出版有限公司,1994 年,引文见第 54—60 页。1984 年,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又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发现两枚文字较多的桃人,参看柳洪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新发现的桃人“木牌”》,载《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 1 期,第 39—40 页。余欣指出:“由此可见,各种‘代人’俑(或象征性的木牌)不仅在内地和敦煌的汉人中流行,而且这种信仰和丧葬习俗有可能已渗透到远在西域的高昌粟特人聚落中。”氏著《唐宋时代敦煌的镇宅术》,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 9 卷,中华书局,2006 年,引文见第 359 页。“代人”(包括“铅人”“锡人”“松人”“柏人”“桃人”等)功能有二:一是代死人承担罚责作役(以免连累死者眷属),二是抵挡死者所犯之咎殃(也有代生者,即死者家属解灾之用。请比较敦煌祁家湾出土西晋十六国时期 M206: 3《口宫华镇墓文》:“今送汝铅人一双,斗瓶、五谷,用赎生人灵魂。须铅人,膺口五谷,死生乃当。”录文参考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4 年,第 108—109 页)。又参考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 年,第 219—222 页;项楚《寒山诗注》,中华书局,2000 年,第 211 页。

② 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第 190—191 页。

③ 姜伯勤《高昌麹朝与东西突厥——吐鲁番所出宾馆文书研究》,载《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 5 辑,1990 年。

④ 这一方面的例子很早就有了,请比较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王利器集解:“刘盼遂曰:高齐出鲜卑种,性喜琵琶,故当时朝野之士时者,多仿其言语习尚,以投天隙。《北齐书》中所纪者,孙搴以能通鲜卑语,宣传号令;祖孝征以解鲜卑语,得免罪,复参相府;刘世清能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之作突厥语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和士开以能弹胡琵琶,因此得世祖亲狎。如此等类,屡见非一。又本书《省事》篇亦云: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天文、书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云云。又庾信《哀江南赋》云: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知鲜卑语、胡书,为尔时技艺之一矣。器案:《续高僧(转下页)

唐书》卷一八三《武承嗣传》：“延秀久在蕃中，解突厥语。”《新唐书》卷八〇《太宗诸子·常山王承乾》亦言李承乾“好突厥言及所服”。又请比较《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陇头行》：“陇头路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兵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国养子孙，今年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入汉家。”此处之“胡语”，指吐蕃语。

汉人通晓兄弟民族语言的例子在吐鲁番出土文献中也有记载：65TAM341：30/1(a)《唐小德辩辞为被蕃捉去逃回事》(4-62):^①“审：但小德今月二日牵车城东墻地，其日斋时，贼从东北面齐出，遂捉小德[并]牛。至夜在苇东[食](?)人定后即发向_____草泽宿至[三]日明，即发入突播山，_____□泉谷宿。至四日夜在小岭谷宿，_____自解手走上山，经三日上山，_____投得[维]磨戍烽，其贼见在小[岭]_____小

(接上页)传》十九《释法藏传》：天和四年……周武帝躬趋殿下，口号鲜卑，问讯众僧，几无人对者，藏在末行，挺出众立，作鲜卑语答，殿庭僚众，咸喜斯酬。敕语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独超群友，报朕此言，可非健人耶？”此亦当时朝野好尚之一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第21页。汉人对其他民族的称呼，除了大家熟知的“胡”外，还有“蕃”，广泛见于吐鲁番文献中。72TAM225：25《武周豆卢军牒为吐谷浑归朝事一(一)》(3-412)：“_____拔褐_____落蕃人瓜州百姓[贺]_____六岁，一匹父五_____草]九岁，匹赤草，七岁，一匹白_____胡禄一_____鞍三(下残)_____究]拾_____刀壹口，蕃书壹_____。”73TAM509：8/7《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石染典买骏契》(4-280)：“开元廿一年二月廿日，石染典交用大练壹拾柒匹，于西州市买从西归人杨荆琬青草五岁，近人颊膊有蕃印并私印，远人膊损。”Or.8212/552Ast. III.3.037《唐西州长行坊马配放簿》(沙1-96)：“一匹赤父七岁，玉面连唇白两眼霞，近人颊古‘之’_____。蕃印次肤。”《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崔慎田”条(出《北梦琐言》)：“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刘肃《大唐新语》卷一三《谐谑》：“则天朝，诸蕃客上封事，多获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则天尝问张元一曰：‘近日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对曰：‘朱前宜着绿，录仁杰着朱。闾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扬吾。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授别敕。”考唐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又蒙降结姊季之缘，敦奖友于之念，并遗书西域二十四蕃。煦饰殷勤，令递饯送。”又言突厥：“虽蕃俗之曲，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关于“蕃印”，参考《唐会要》卷七二“诸蕃马印”条。朱雷言：“在唐代，就广义而言，‘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波斯，吐蕃及坚昆都督，北至突厥、契丹、靺鞨，并为入蕃。’(《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一六“和戎”条引杂令)《唐会要》卷七二“诸蕃马印”条中，‘诸蕃’包括40余部，整个唐王朝西北、东北，远至今撒马尔罕地区的康国，都包含在内。”见朱雷著《敦煌所出〈唐沙州某市时价簿口马行时沽〉考》，《敦煌吐鲁番文书论丛》，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1—224页，引文见第223页。李树辉指出史籍中的“西蕃”除了指吐蕃外，还可以指称突厥语族群和印欧语族群。见氏著《西州“贞元七年没于西蕃”中的“西蕃”是指吐蕃吗》，《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关于“蕃印”，参考也小红《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第67页。《通典》卷一九九《边防十五》“突厥”条下：“突骑施乌质勒者，西突厥之别种也。初隶在斛瑟罗下，号莫贺达干。后以斛瑟罗用刑严酷，拥众背之，尤能抚恤其部落，由是为远近诸胡所归附。其下置部督二十员，各统兵七千人。常屯聚碎叶西北界，后渐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国相接，东南至西、庭州。斛瑟罗以部众削弱，自武太后时入朝，不敢还蕃，其地并为乌质勒所并。”又请比较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仁宗庆历年”条：“西北边皆有蕃兵。蕃兵者，塞下内属诸部团结以为蕃篱之兵也。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塞者谓之属户，余谓之生户。陕西则秦风、泾原、环庆、鄜延，河东则石隰、麟府。其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以上为军主。”

① 本件纪年已缺，另面为唐开元五年牒，今列于后。

德少解[蕃]语,听贼语,明□拟发向驰岭逐草。其抄小德等来□可[有]二百骑,行至小岭谷内,即逢。”

二、语言翻译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也是一条语言翻译之路。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有翻译方面的专门人才——“译语人”活跃其间。^①从《全唐文》卷二八七《敕罽宾国王书》以及卷一〇〇《结骨国》可以看出在安西四镇节度使以及安西都护府都有传译语和译使。综观丝绸之路上的“译语人”,主要是胡人,特别是粟特人。粟特人有着语言方面的天赋,检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长而奸贼残忍,多智计,善揣人情,解九蕃语,为诸蕃互市牙郎。”《唐会要》卷六一“弹劾条记”:“永徽元年(650)十一月二十四日,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此处之译语人史诃担是出身史国的粟特人,其墓已经在固原发现。^② 64TAM29: 17(a), 95(a)《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一)》(3-346):“[垂]拱元年四月日,译翟郎你潘连亨白。”这里的“翟郎你潘”也是粟特人,他为西域商人担任翻译。^③ 72TAM188: 87(a)《唐译语人何德力代书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收马价抄》(4-41):^④“右酬首领多亥达干马叁匹直。十二月十一日付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领。译语人何德力。”此件文书反映了唐西州与东突厥交兵的时代背景。译语人何得力也是粟特人,他代突骑施首领多亥达干签收马价。何得力虽然是粟特人,但却是汉语翻译,穿梭于西州的贸易中。

唐西州时期,高昌县译语人主要从事唐西州与西突厥之间的翻译工作。他们在担任翻译的同时,还为商人充当证人和保人的角色。西州译语人为官府工作,应该有正式编制。73TAM210: 136/10-3《唐史王公□牒为杜崇礼等绫价钱事》(3-38):“[高] [昌]■□人杜崇礼[等]上件物及□到,谨[牒]。四月一日史王公□。紫 绫等价[及]■□译语人等□”73TAM210: 136/10-2《唐西州高昌县译语人康某辩辞为领均资练事》(3-39):“[高]昌县译语人[康]■□军资练拾匹□领□辩:被问付[上] □□□但□”

^① 参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页;赵贞《唐代对外交往中的译官》,载《南都学刊》2005年第6期;韩香《唐代译语人》,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期。又请比较(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会昌五年七月九日”:“缘楚州译语有书付送涟水乡人,所嘱令安存,兼计会留钩之事。”

^② 参看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55—77、206—211页。

^③ 参看王启涛“‘目’翟”二姓与粟特关系新证,载《民族研究》2017年第1期。

^④ 表明此件文书图版见于唐长孺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肆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1页。